

“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与周立波创作精神的当下弘扬

□李沛霖 岳凯华

今年3月，中国作协启动了“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面向全国作家和文学写作者发出了征稿邀请。这一计划旨在以原创长篇小说形式聚焦新时代中国山乡天翻地覆的史诗性变革，向伟大时代、人民、土地、实践致敬。“山乡巨变”的命名，既与新时代中国乡村的巨大变革相呼应，也跟周立波当年所写的乡村题材长篇《山乡巨变》有关。因此，本文试结合这个创作计划来谈谈周立波创作精神如何在当下弘扬和传承的问题。

聚焦时代新变，反映时代气象

书写新时代的山乡巨变，长篇小说创作需要聚焦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之后，中国广大农村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所发生的巨大变化，这是中国共产党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所采取的重要决策，所部署的重大行动。因此，当代中国的作家和文学写作者应该积极用自己的如花妙笔多角度展现乡村的时代变迁，生动讲述感动天地的山乡故事，塑造有血有肉的人民典型。

深入生活，感受时代的气象，才能写出新时代的新史诗。这是周立波等那一辈作家留给我们的经验。1944年，开垦南泥湾的三五九旅到南方去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这时已离开鲁艺、调至《解放日报》编副刊的周立波，主动申请，积极要求参加这次南征。作为司令部的秘书，周立波在艰苦卓绝的南征北返中与部队一起冲过100多道封锁线，纵横7个省。在极端艰苦的300多天的战斗环境中，周立波从未间断记日记的习惯，后来这些日记成为了报告文学《南下记》《万里征程》等作品的素材和基础。他的政委王首道曾云：“如果说我们南下的同志是钢铁战士的话，周立波就是钢铁的文艺战士。”1946年7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发布了号召“不分文武、不分男女、不分资格，一切可能下乡的干部统统下乡去”的《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10月份周立波便随军转战到了当时的松江省尚志县元宝镇，当上了土改工作队的成员，成为了10万土改干部的一员，后又到松江省五常县周家岗“补充生活”，还到拉林与苇河的一些村屯以及呼兰县的长岭区采访。正是这场火热的三年土地改革运动，激励着周立波利用业余时间写小说。他花了整整3年的时间，终于写成了32万字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于1948年在东北书店正式出版。

如今，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号角已经奏响，新时代山乡巨变的图景正在徐徐展开。新时代的作家应该像周立波那样，真正用心体会乡村世界的内在逻辑，写出时代性的史诗巨著。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获取素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目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已经成为了党和国家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重中之重的工作。地域辽阔的中国

农村区域发展不平衡，东西南北的乡村存在很大的差异性。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要想写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乡村振兴战略扎实推进的乡村巨变，就需要扎根新时代的山乡大地，真正沉入农村生活深处，拿起笔去描绘、书写自己亲身经历的“山乡巨变”，从而向人民、向时代、向历史交上一份合格的文学答卷。

周立波是现当代中国作家中深入生活、扎根乡村的代表之一。且不说新中国成立前周立波3年扎根东北创作《暴风骤雨》的情形，单说其1949年后的故事也颇能说明问题。1954年，周立波在农业合作化的高潮中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湖南老家邓石桥清溪村，参加了益阳县谢林港区发展互助组、建立初级农业社的工作。可能是觉得这简短时间的生活体验不过瘾，走马看花的所得只是一些表面印象，所以周立波第二年便毅然将全家迁回湖南益阳农村，住进了桃花仑乡竹山湾村，同时还担任了附近大海塘乡互助合作委员会的副家党第一书记。在广袤的乡村大地上，周立波与老乡在一起，与农民交朋友，或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去地里挖土，下田做农活、插秧，对农村生活的观察不只细致入微，有时甚至到了入迷的程度。他兴致勃勃地看农民驱牛、骂牛，学习相牛、用牛，喜欢听乡下各种趣闻传说，还爱打破砂锅问到底，人们亲切地称他为“立波胡子”“凤翔哥”“风老三”。周立波曾说，“从事创作的人最重要的条件是要有丰富的生活经历，和对于人的广泛和深刻的观察，然后就是动笔多练笔。”就是这样通过多年与家乡农民的朝夕相处和采访观察，同农民群众劳动、生活在一块，与老乡村民真正打成一片，周立波终于写出了反映乡村在农业合作化运动进程中发生巨变的长篇小说《山乡巨变》正篇（1958）和续篇（1959）。这就是一部从泥巴里“拱”出来的小说。

如今，“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的启动，就需要一批批像周立波这样的人民作家，不负时代和人民的重托，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不只是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简单的表面化呈现，而是要承担着诗意呈现山乡巨变的历史使命，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把心思沉下去，把身子扑下去，长时间地细致观察，“到了农村和工厂，要动脑筋，要用眼睛、耳朵、鼻子和一切感官去体验一切形式的生活”，以观察者、书写者、沉思者的角色发力，创作出具有时代高度、思想深度、历史跨度的长篇小说，谱写新时代山乡巨变的美丽篇章，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和大力推进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以催生优秀作品为中心任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衡量一个时代的文艺成就最终要看作品，衡量文学家、艺术家的人生价值也要看作品。”中国作协在“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征稿启事中，希望所有作家和文学写作者能够“创造配得上新时代新征程的文学新经典”，“写出有时代温度的精品力作”。因

此，参与“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的作家，应该以精品力作为中心目标开展创作，以精品力作展现新时代的精神高度，体现新时代的思想深度，彰显新时代的文明程度。要以精品意识创作出“不拘于一格、不形于一态、不定于一种”的文学作品，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新时代。

周立波的文学地位，人们已经有过较为中肯的评价，被人视为是中国当代最杰出的社会主义文学家之一。作为革命作家的代表，周立波追随革命，有着丰富的革命文学、左翼文学的创作经验。同时，他的文学创作有着缘于西方文学精华和古典文学传统深度滋养所培育的精英意识和诗意精神。周立波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山乡巨变》和短篇小说《山那边人家》《牛》等，既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又努力做到雅俗共赏。因为周立波具有较好的中国古典文学功底，又打下了扎实的西方文化基础，不仅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达近百万字，而且积极吸纳俄苏文学的影响，同时也密切关注世界文坛的走向，阅读了大量外国作家的作品。这些深厚而广博的中外文学素养和积累，无形之中使得周立波的创作在情节安排、风景描绘、细节描写、语言运用等方面具备了精品特质。

无论是反映东北地区轰轰烈烈土地改革运动的《暴风骤雨》，还是反映湖南乡村在合作化运动中发生深刻变化的《山乡巨变》，其主题、写法、风格都与《毁灭》《被开垦的处女地》等世界文学名著相似。这就决定了周立波的乡土文学写作不会完全依赖于乡村民间文化的资源，而是积极吸收古典文学简练生动和外国文学细致严密等长处，并在此基础上着重突出文学的民族风格和地方色彩，“描写细腻，形象鲜明，文风质朴，语言生动，富于生活气息和生活情趣”。

“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培育的乡土文学长篇要成为精品力作，固然需要散发着青草、泥土混合的浓重的乡土气息，取民间艺术的“俗”，土香土色，但也要兼取中西经典文学的“雅”，自然而然地流露和呈现阳春白雪般的诗意品质，真正做到雅俗共赏，将民族风格、地方色彩、乡土味道、田园韵味、典雅品格、精英意识和诗意精神和谐地融入一幅幅新时代山乡巨变的文学世界中。

周立波那一辈作家的创作，已经为反映新时代山乡巨变的创作奠定了优良传统。今天，我们要继承周立波那一辈作家的创作精神，生动描画一幅幅栩栩如生、趣味盎然的山乡巨变画卷，创作出更多个性鲜明、赏心悦目的文学经典。

（李沛霖系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岳凯华系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家以及原在工业文学领域卓有成就的作家，对工业题材的把握，毋庸置疑要高于其他作者。他们积累的优势与出手的力作，能增大工业文学作品的阅读量，具有不可替代的感召力与感染力。这就供职于工业领域的文学写作者，更应将自己的写作重心放在自己所供职的工业领域。“写自己熟悉的生活”，这是一代又一代的文学家从写作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典之言。作者对某个领域参悟得深，行文驾驭起来，更容易得心应手。同时，要扩大发表、传播平台。文学刊物尤其是文学名刊、大刊，应增大工业题材作品的刊发份额，与工业题材写作者积极沟通，开辟优质稿源。中国是工业大国，应当有能与之相匹配的专门的工业文学刊物。之前上海有份刊物叫《工人创作》，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但现在未见踪影了，甚是惋惜。根据国家工业日新月异的发展，应创办专门的工业文学刊物以适应工业文学的需求，为攀登工业文学新高峰再创造条件、增添土壤。

令人欣喜的是，全国工业题材文学大赛、“顺德杯”中国工业题材短篇小说大赛、草明工业文学奖等工业文学领域的举措，引起文学界的关注。这些工业文学赛事，定会有助于工业文学的发展前行。但不能仅以此为限，还得扩大范围。国有大中型企业，几乎都设置了新闻宣传机构，配置了专门的采编人员，对在不同平台发出的新闻稿件给予不同的奖励。但却没相应的文学机构与专门创作人员。把两者相比，决无责斥厚此薄彼之意。企业新闻宣传与企业文学工作，同样是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原是企业新闻宣传从业人员，后因工作岗位变动，重心移至工业文学，两者都介入、实践过，感悟尤深，故无扬此抑彼之意。需要说明的是，在企业找出好的新闻采编人员不是难事，若要找出能创作出作品的文学写作者，真的难。

鲁迅先生说，“要改造国人的精神世界，首推文艺”。作家以他们艰苦的写作和卓越的创造，表达了中国人的生活和思考、奋斗和梦想，证明了文学在这个时代的力量。置身工业战线的文学写作者，先别管受重视与否，首先要增强自己的责任感、自信感，静下心来，静观工业，不弃不舍，做出业绩，自会蹚出一条宽阔道来。

文学是入学，人类生生不息，文学之河长流。虽然现有的工业文学表现不尽如人意，但只要各方给力打造，定会依循原有的良好态势，一如既往地向前行，繁花似锦。（作者系重庆报告文学作家）

一、诗的灵感从生活中来

优秀的诗，都不是模仿而来。诗的灵感是从生活中产生的，诗是生活的儿子。俄罗斯作家列夫·托尔斯泰说过：“从诗得来的诗不可能感染人。”从诗得来的诗，就不是生活的“儿子”了，变成了生活的“孙子”。诗人固然应当向同类题材的诗作学习，但是，不应因循守旧，甚至蹈袭别人。优秀诗人懂得坚决地摆脱窠臼，务去陈言，探新寻路。没有超凡脱俗的出新，在同一题材上，诗就会撞车。唐人李翱说“创意造言，皆不相师”，清人郑板桥说“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均为不刊之论。

二、诗人是文明的“原始人”

诗人是文明的“原始人”。与同时代人相比，诗人更文明，也更“原始”。诗人比同时代人更“原始”，是指他进入创作过程后的前逻辑心态。这种前逻辑心态，使得诗人此时似乎是来到世界的第一个人，他用惊喜的目光打量自己的四周，给世界万物命名。他似乎不懂得人们习以为常的基本常识与逻辑，而是对生活作出不同凡响的新奇领会与感应。诗人见到的世界是心灵的太阳重新照亮的世界。

三、诗是有节奏的语言

大学讲堂总是讲，诗与散文在语言上的根本区别在形象性和精练性。其实，形象性和精练性是任何一种文学样式都在追求的目标，并非诗歌独有。唯有神圣的音乐性把诗和散文区别开来。内外节奏就是其音乐性的基础。翻开中国古代诗歌史，古诗和音乐的关系从未密切。从古乐典雅的《诗经》和汪洋恣肆的《楚辞》开始，乐府诗、绝句、律诗、词曲都离不开和音乐的联姻。从“以诗入乐”到“采诗入乐”再到“倚声填词”是中国古诗的音乐性的流变过程。用耳听诗质上去捕捉诗情的音乐性，用眼从诗形上去捕捉诗的音乐性，这是中国诗歌几千年为读者造就的审美习惯和审美标准。读读倡导散文美的诗人艾青的后期作品就可以发现，艾青后期的短诗大都已经成为半格律体了。他在1980年新版的《诗论》里还加上了一句话，自由诗要“加上明显的节奏和大体相近的脚韵”。我认为，这是艾青对诗学思想的发展与完善。

四、极端自由与极端不自由

诗在想象世界是极端自由的，它上天入地，不为外部世界所局限。诗人在写诗时处于“内眼闭而心眼开”的状态。诗人的“心眼”可以依照自己的抒情逻辑将外部世界所分开的东西结合起来，把外部世界所结合的东西分开来。但是，比起一般语言，诗家语受到诗律（节奏式、韵式、段式）的限制，又极端不自由。在一般语言中，人们跳过了语言的声音，只求理解语言所表达的意义。而在诗歌语言中，语言要通过诗律不断提醒人们注意自己。换言之，诗家语不但要表达感情世界，而且它自身的形式也成为受众的鉴赏对象。因此，它必须精致。这种极端的自由与极端不自由的统一，构成诗一系列的特点。

五、诗家语的美学特征

一与万、简与丰、有限与无限，是诗家语的美学特征。诗人身上，总是存在两种相反品格的统一：内心倾吐的慷慨和语言表达的吝啬。从中国诗歌史看，中国诗歌的四言、五言、七言，还有近体诗、词、散曲和新诗，一个比一个获得倾吐复杂情感的更大的自由，这样的发展趋势和社会生活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遥相呼应。可是从表达着眼，与诗歌内容的由简到繁正相反，诗家语却始终坚守着、提高着它的纯度，按照由繁到简的方向发展。五言是两句四言的省约，七言是两句五言的省约。新诗应该注意这一点，这或许是诗歌艺术发展的一条隐秘法则。

六、抒情诗以短为佳

音乐性带来抒情诗在篇幅上的简约。除了叙事诗和政治抒情诗，抒情诗大都是玲珑的珍珠，体小而光亮。在《美学》第3卷中，黑格尔有一段很精辟的话：“事件构成史诗的内容，像风飘过琴弦一样震动诗人心灵的瞬息感觉构成抒情作品的内容。因此，无论抒情作品有怎样的思想，它不应该太长，往往应该是很短的。”篇幅特点带来诗家语的一系列特点，即诗家语的每一个字都要诗人付出很辛苦的劳动，才能于方寸之间见乾坤。明代李东阳这样题柯敬仲的墨竹图：“莫将画竹论难易，刚道繁难简更难。君看萧萧只数叶，满堂风雨不胜寒。”可以说，由于诗歌篇幅的局限，诗家语追求的也是这种功力，力求把“萧萧数叶”变为“满堂风雨”。

七、诗歌传播的两个向度

大众传播有两个向度：空间与时间。不仅有“传之四海”的空间普及，“流芳千古”的时间普及也是其大众化的表现。李贺、李商隐生前少知音，但他们的诗歌几千年持续流传，成为诗歌文化传统的一部分。诗歌的这种隔世效应也是一种常见的大众化现象。唐诗宋词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高峰，也是大众化程度最高的诗歌，只要是中国人，大多能背出几首佳作。因此，唐诗宋词成了中国人的文化标志之一。

八、新诗第二个百年的重头戏应该是“立”

作为中国诗歌的现代形态，新诗同样需要确立诗之为诗的文体规范，反对确立这个规范是没有依据的，也是没有说服力的。这个规范不是理论家说了算，而是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逐渐形成。诗歌像其他门类的艺术一样，永远是寻求新变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诗歌。然而在“变”中总会有一些常态的诗歌元素不变，正是这些“常”才是新诗之为中国诗歌的现代形态的“资格证书”。“常”的内容之一就是文体规范。重新认领这些“常”，守常求变，是当下发展新诗的重要话题。无变之常，是僵化；无常之变，是闹剧。新诗在“变”中有时回望“常”的必要。没有文体规范，伪诗、质量低下的诗就有了生存空间，写诗就成了世间最容易的事了。必须提高写诗的难度，在诗歌文体规范里寻找张力，在诗歌审美法则里寻找自由。（作者系西南大学教授）



攀登工业文学的新高度

□陈启兵



工业文学无疑是巍然国家文学大厦的重要构成部分。何谓工业文学，如果系统地进行文学理论阐述，必是洋洋长篇或专著厚籍。简而言之：它写的是工业，彰显的是工业。写出来的作品要有鲜明的工业特质。不管作者采用什么样的叙事方式、何种文本架构，但都要真切反映工业领域的成功与挫折、困惑与突破，还有工业人的喜悦与忧患、命运走向的顺境与逆境等等。

工业题材是文学写作的富矿，这是文学界的共识。海内外的文学大家包括一些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都曾在工业文学领域有卓越建树。他们出手的重磅作品，不仅是时代工业走向的反映，重要的是彰显深度变革的时代气象。阅读了他们的作品，就能感知、把握时代的脉搏。被视为“新中国工业文学拓荒者”的作家草明，其创作的《原动力》《火车头》《乘风破浪》等系列工业小说，被评论为“集中呈现了20世纪以来一个古老的农业大国追求工业现代化途程上的积极探索和艰难跋涉”。作家张洁的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获得第二届茅盾文学奖，“该小说对改革的紧迫性与艰巨性以及所面临的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进行了深入描绘”，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作家蒋子龙的短篇小说工业小说《乔厂长上任记》首开“改革文学”先河，出自其手的“系列表现工厂、城市改革的中短篇小说，对引领思想观念转变、推进改革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激发了全国上下的改革热情”。还有一些名家、大家以及为数不少的优秀文学写作者，他们将目光、执握的笔端，瞄准、指向工业领域，不懈进取，执着耕耘，笔下流淌出的反映工业的瑰丽篇章，既为工业文学乃至整个文坛增添了绚烂色彩，又为自身获得人生高光。

但平心审视，现有工业文学的状况与曾有的良好状

势相比，令人感到有些遗憾：缺少上述所说那样的名篇佳作。现今工业文学作品之所以叫不响，愚认为，主要症结在于：文学大家包括曾在工业文学领域卓有建树的名家，淡出工业文学领域的写作。名家、大家选择写什么，是他们的人生自由、权利，他人不能干预。但本已在工业文学领域攀顶的名家、大家，若继续在这块领域发力，定会为工业文学再添锦绣华章。甚至本就供职工业战线的文学写作者，也是着墨它处，其理由是工业文学作品难有成就，难以刊出或出版，所以改在农业、都市、传奇、民俗、言情、武侠、历史等题材上下功夫。打开文学期刊，少甚至还有没有工业题材作品。这或许是与缺少工业力作、佳作的因素有关联，但若遇上对工业文学不感冒的编辑，当有工业题材力作、佳作摆上他案头，也有可能不会出现遗珠之憾。

另外，凡是涉及现实题材，其中都存在“尺度”的问题。上世纪中叶，石油32111钻井队在巴蜀的江津、合江交界处作业中，发生不测事件。全队职工不畏生死扑灭大火，避免发生更大灾难，保住国民经济急需的大气田，壮举感动全国。有作者以32111钻井队壮举为原型，创作了一篇短篇小说，将石油英雄主义表述得淋漓尽致。而文学刊物编辑，包括石油工业领域文学刊物的编辑，却认为这是个灾难事故，不敢刊发。作者当然不会去忤逆编辑，但从文学价值与意义上审视：“灾难是文学艺术诞生的原因之一，也是文学诞生后不断书写的重要母题。”不能因为涉及灾难，就不敢发表。当然，也可能是编辑觉得作品质量不行，以“涉及灾难”为理由拒稿。

如何破解现有的工业文学窘境？根据上述所列症结，愚认为，名家应持续跟进，积极介入。名家尤其是大